

日本组的功绩和遗产

——读王雪萍编著《战后日中关系与廖承志》
——中国的知日派和对日政策》

马场公彦

一、日中两国的特殊关系

1992年,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日本综合评论杂志的论坛上回顾了关于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及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意义。几乎所有的综合杂志都刊登了为日中友好关系打下基础,包括民间人士在内的“挖井人”的证词。当时,中方的重要证人为孙平化。孙平化是自20世纪50年代初就负责中国对日工作的廖承志的部下,曾担任LT贸易廖承志办事处东京联络事务处首席代表,又在邦交正常化前夕赴日,成功促成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他还长期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职务。孙以轻松诙谐的语气回忆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前双方的频繁往来:

当时在国内的一部分人中产生了如下疑问:为什么要与日本如此热烈且频繁地接触?周总理为什么总要接见所有日本代表团?是否有这个必要?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可没有这个待遇。这是无论何时都会出现的质疑,也就是说外交需要保持平衡的观点。但是周总理却告诉我们他的观点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特殊性,所以必须在承认其特殊的前提下去思考问题。即中国和日本之间不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其他各方面来看,都存在其特殊性,不能因为与其他国家不如此,就不能和日本频繁接触,这是错误的想法。^①

周恩来总理曾一直强调中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着和其他国家不同的特殊关系。在纪念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之际,孙的这一言辞包含了日本应重新回到与中国的特殊关系这一历史上的信息。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接见最多的外国人就是日本人,在他与外国代表团举行的726次正式会见中,日本代表团占了144次。^②

^① 森住和弘「日中国交回復の扉はこうして開けられた」、「中央公論」7月号、1992年、148—163頁。森住和弘「日中国交回復の扉はこうして開けられた—続」、「中央公論」8月号、1992年、146—165頁。

^② 李恩民「周恩来と日本—人的ネットワークと対日外交の展開を中心に」、川島真、劉傑編「対立と共存の歴史認識—日中関係150年」、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309—338頁。

为什么中国和日本之间有特殊的关系?

第一,因为日中两国在地理上是相邻的两个大国,同时又有以文化经济纽带紧密相联的历史关系,尤其近代以来两国共有一段因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带来的不幸历史。

第二,双方虽然是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邻国关系,但从二战结束后到1972年9月邦交正常化,两国一直没有邦交,只能依靠民间外交或半官半民的特殊的非国家关系来确保双方的国家利益。这也是两国关系特殊的原因之一。

第三,在美苏对立的冷战时期,对中国而言,日本是关乎其生死存亡命运的重要国家。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不但可以让中国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还是其夺回台湾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珍贵的外交资源。

那么,中方所说的两国的特殊关系是在怎样的组织和作用下进行的呢?为分析这一点,有必要弄清楚1949年后从指导到各项具体工作的执行,对中国对日工作进行统筹策划的机构日本组^①的实际情况。廖承志是日本组具体工作的负责人,到目前为止,有关他的生涯和事迹已经在一些传记和文集中有详细的叙述。^②作为曾在日本长期留学并生活过的知日派政治家,廖承志在日本也广为人知。可是,日本组乃至廖班(以廖承志为首的知日派工作人员小组)组织的全貌和工作的具体情况,至今仍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分析,只是停留在当事人的回忆或传记的程度。

日本的日中关系研究,以往是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史等领域研究人员依据中央政府官邸及外务省(外交部)档案或政治家、政府官员等外交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即从官方外交的观点来探讨两国政府间的外交谈判过程占据主流。此类研究的重点首先是那些能够左右两国关系的重要角色,即属于正式外交渠道、参与双方正式接触的政治家和财界人士,其次是两国民间贸易机构、友好商社、财政界等希望维持和发展日中友好关系的次级谈判人士的作用。^③的确,日中邦交正常化是外交官员和首相官邸等日本政要为主角进行对华外交谈判的结果。可是,在之前两国没有邦交关系期间,双方关系主要依靠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人士和日中友好人士、民间的交流活动来维持的。回顾邦交正常化以前的日中关系史,还必须要从人民外交或民间外交的角度来考察。但是,以往关于日中关系的研究,民间或国民等因素不是被排除在外,就是被放在次要的位置。

笔者认为要准确了解两国关系的实际情况,不单要分析两国政府间的官方关系,还应该采纳多渠道外交的观点,从“市民外交”的视点上进行探讨。把分析的对象从主导日中关系的两国首脑、外交官员,扩展到民间、市民等多元化层面,把对两国关系产生影响的非国家性要素也纳入考察的范围。因此,研究分析的范围不应仅限于两国的国家利益,而还要考虑到两国国民对中国、对日本的认识,或者民间观点、公众知识分子的舆论等要素。以前民间力量介入外交谈判在日本被认为是妨碍国家“一元化外交”,所以倾向于回避。而现在的外交活动,不只是首相官邸,那些活跃在

^① 1949年后到文革初期,负责中国对日工作的组织和机构,一直在不断变化,其名称也不完全相同,但其负责人一直为廖承志,而从周恩来总理到许多底层对日工作人员对其的一般称呼为日本组,所以尽管日本组不是正式名称,但在本文中暂且以此代指当时中国的对日工作组织。

^② 吴学文、王俊彦:《一门忠烈:廖氏家族》共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铁竹伟:《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王俊彦:《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廖承志文集》编辑办公室编《廖承志文集》,德间书店,1993年,等。

^③ 西原正「日本外交と非正式接触者(日本外交の非正式チャンネル)」、『季刊国際政治』第75号、1983年10月、1—11頁。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日本外交の非正式チャンネル」、日本国際政治学会、有斐閣、1983年。山本吉宣「市民外交——国際システムの変容の中で」、井上寿一ほか編「日本の外交 第六巻 日本外交の再構築」、岩波書店、2013年、201—234頁。

NPO、地方自治机构、经济界等领域的民间人士都可以成为外交活动的要素而获得积极评价。因此,在外交研究领域里,我们也应该顺应这种时代的潮流转变研究的方向。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副教授王雪萍,作为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课题小组带头人,决定彻底分析专门负责统筹中国对日民间外交的日本组的具体情况。面对这一尚未得到开拓的研究课题,需要迎接许多新的挑战,更要求该小组进行庞大而缜密的实证性研究。王雪萍编著的《战后日中关系与廖承志》一书正是查证了日本组自1952年成立到1972年邦交正常化20年来活动的开展和变化过程,是一部由多方学者精诚合作,历时两年多完成的研究成果。^①

这部经过辛苦调研而完成的著作得以出版有以下三个背景。第一,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三方精英学者,将多角度的问题意识集中到阐明日本组这一点。为了阐明该中国对日工作机制的全貌,他们各自分担不同的研究课题,并定期召开会议进行讨论,是一种有计划并系统性的国际共同研究方式。第二,该项研究也得益于2004年以后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对1949年后至1965年外交档案的公开,使研究具备了较好的资料条件。第三,除了参照与廖承志、日本组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文集等资料之外,科研小组成员还特意采访了32名当时在中国负责对日工作的当事人,获得了珍贵的口述历史记录。作为补充资料,本书最后部分收录了其中对丁民(原外交部日本处处长)和周斌(原中国领导人翻译)两位当事人采访的部分详细记录。

二、日本组的任务和职能

本书共分为三部分。以下笔者将按照目录介绍其内容并进行评论。

第一部 廖承志与廖班——人员和组织

第1章 廖承志和廖班的对日工作人员(王雪萍)

第2章 协助在华日侨回国与廖承志——廖班的形成、发展及其参与(大泽武司)

第3章 中国的对日经济外交和廖承志的任务——实务统筹、政治协调、象征(山影统)

第4章 中国的对日工作与留日学生、华侨——培养人才、对日宣传、对华协助(王雪萍)

作为政府官员,廖承志按其工作内容区分,可以说主要负责以下两部分具体工作。一是作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负责海外华侨业务。另一个是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外事尤其是对日工作,是推进与还未正式建交的日本进行外交活动的总负责人。该书关注的是后者,目的是分析日本组工作的全貌。

对日工作,鉴于以上所述之日中两国的特殊关系,中国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外交方式,即所谓“廖班方式”。

第1章、第2章是关于中国对日工作具体组织结构的概论。“廖班”,顾名思义,是由熟知日本的知日派政治家廖承志管理的工作团队,开始于1952年《日华条约》签订以后。日本组是忠实执行毛泽东(党和国家主席)、周恩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制定的对日政策的组织,直接受命的廖承志是“无决定权的协调人”(第2章第64页)。因此,虽然廖承志在文集中保留了当时的原稿并公开出版,但在官方场合他本人并不会提及自己的私事也不会发表个人意见。除了在《人民中国》杂志上刊登的回忆录之外,基本上没有留下任何表达其私人观点的东西(或者没有公开)。可以说作为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廖终其一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① 王雪萍编著「戦後日中関係と廖承志——中国の知日派と対日政策」、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3年。

在组织结构上,廖班是一个跨部门的专门工作组,各相关部门的外事干部根据不同案子的性质、内情工作。具体而言就是与中联部、外交部、外贸部等各类相关部门合作。1958年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成立之后,与各相关部门合作进行的对外事务中,专门负责日本组具体事务文书工作的部门被称为“小日本组”,而由各机关部委里的日本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的制定对日政策并负责具体执行的小组被称为“大日本组”。两者协同合作开展对日工作的实际业务体制如下:

“大日本组就政策的提案、实施进行讨论,其结论由小日本组形成政策文件,提交给毛泽东、周恩来。根据毛、周的最终方案,由大日本组讨论执行方案。在决定各部门的业务分担之后,由大日本组的成员传达给各相关部门,同时由廖班,即身属各部门的对日工作人员负责执行。”(第1章第33页)。

比如从1953年开始的协助战后残留中国日侨归国的工作,以廖承志为首席代表的日中“回国”谈判北京会议组织召开,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和命令,廖承志向毛、周二人提交了“请示报告”。廖承志下设秘书组、接待办公室、联络班,而对日谈判的代表机关则是中国红十字会(第2章)。

在对日经济外交方面,1953年第2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签订。此后,在1958年2月对日谈判窗口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成立之前,廖承志在国际活动委员会中召开对日工作会议,制定基本方针,向外贸部、外交部发出具体指示,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充当对日窗口。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成立以后,小日本组处理日常事务工作,大日本组制定基本方针,向外贸部、外交部发出指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则继续承担对日谈判窗口的职责(第3章)。

廖班(包括小日本组和大日本组),任用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知日派工作人员,成为对日友好人士的源泉。具体包括廖的“四大金刚”赵安博(中联部)、王晓云(小日本组)、孙平化(中国对外友好协会)、萧向前(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等,仅大日本组就有20多位。

1949年后中国政府的第一代对日工作人员大部分在1949年前就曾经与日本或日本人有过密切接触。廖的“四大金刚”都是在1949年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比如赵安博、王晓云曾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敌工部)工作,而孙平化和萧向前出生于伪满洲国,且曾经留学日本,抗战时期回国并参加革命。新中国初期,还有很多对日工作人员是从回国的留日学生和华侨中选拔出来的。当然,也有从国内学习日语的人员当中培养出来的例子,如王效贤,这种情况初期并不多,不过随着国内教育水平的提高,规模也不断扩大(第1章)。在小日本组和大日本组的指导下负责具体工作的对日工作人员的情况,书中对1949年后留日学生、华侨贡献的叙述部分也有详细介绍(第4章)。例如,1949年后在长春成立的第一家专门从事日本研究的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那里的学生毕业后也有一些从事对日工作。像他们这些中下级对日工作人员,具体的工作任务是什么,通过采访等调查可以有所了解。

关于日本组,以前关注的重点只是廖承志的为人,这在许多的传记中都有描述。但是,该书第1部里关注的是日本组作为对日工作机构的功能和作用,由此阐明了中国视角的战后日中民间交流的实际情况。中国的对日民间外交机制,是根据不同问题组织不同的部门合作,有针对性处理问题的临时性跨部门组织,组织独特,功能特别。按照对日工作业务的不同,组成特别工作组(大日本组)以联合各部局内部的对日工作人员进行工作,其核心处理事务工作的机关是小日本组。廖承志领导的小日本组和大日本组里的对日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有过在延安敌工部工作、或在伪满洲国出生、留学日本等丰富的阅历。这些人日语能力强,有丰富的日本知识,业务水平高,忠实地履行毛泽东周恩来的决定,有方法,效率高。

三、从国际关系角度看日本组的对日工作

第二部的结构如下：

第二部 中国、日本、“国府”围绕廖班对日工作的攻防

第5章 知日派的对日工作——以东京联络事务所的成立过程和其活动为中心(杉浦康之)

第6章 日本眼中的廖承志对日工作——以自民党亲中派为中心(井上正也)

第7章 廖承志的对日工作与台湾——以LT贸易协定、廖承志访日为中心(戴振丰)

战后日中两国间并没有缔结正式的外交关系。那么战后中国的对日外交是以何种方式开展的？据该书共同执笔人刘建平研究，新中国初期中国的对日外交最初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框架下由统战部负责，1951年初改由中联部负责，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之间的党际外交，以人民外交的形式开始的。^①

1952年5月以后，廖承志领导的对日工作办公室和中央日侨事务委员会成立，开始了“以民促官”方式的民间外交，直到50年代中期，都与中联部主导的人民外交交错并行开展对日工作。1955年3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意在使对日政策更为制度化。1958年3月，随着中央机构改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开始负责与没有邦交国家的外事活动，中联部主导的人民外交走向结束(第2章第59—61页)。

同年5月，长崎国旗事件的发生导致了日中两国民间贸易全面停止。1962年11月，根据廖承志与高崎达之助之间所达成的备忘录，LT贸易体制开始启动，双方分别在东京与北京设立了常驻办事处。廖承志办事处即作为中方的通商代表处和贸易事务所成立并发挥作用。至此，半官半民的对日工作方式形成(第5章)。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日本组的工作陷入停滞状态。1971年以后，受尼克松冲击和日本政界出现的对华关系正常化动向的影响，东京联络事务处的对日工作得以恢复。1972年9月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中国的对日工作结构变成了外交部领导的“官官外交”。

中国的对日工作方式，顺应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而改变方式。1952年民间外交方式开始以后，经日中邦交正常化，直到1973年4月廖承志率领访日团加强两国政府关系，始终是日本组在全权负责对日工作。而对日政策的提案、决定，并对日本组下达政策指令的一直是周恩来。为什么周恩来把无邦交时期的日中关系定位为特殊的两国关系，在与诸多国家的外交事务中尤其重视对日工作呢？其答案可以从该书第6章和第7章找到。

可以说在邦交正常化之前，中国对日工作坚持的要点是利用日美矛盾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在日本政界扩大亲中派势力。新中国初期，中国政府与日本共产党联手，希望增加日本国内的反美势力，加强其革命力量，但日本共产党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失去了日本国民的支持。其后中国把目标转向日本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但最后判断社会党夺取政权之路布满荆棘，十分困难。于是希望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来分裂日本的保守势力集团，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执政党自民党身上。具体而言，就是往自民党岸信介和佐藤荣作首相阵营中镶进楔子，把自民党主流派，也就是自民党内亲台派的反华势力，变成其党内部的亲中左派。为此，日本组以东京联络事务处为中心积极收集日本信息。还打破了民间贸易中的“政经不可分”原则，转变日方一贯主张的“政经分离”和“积累”方式。

^① 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日本组不仅收集日本信息,还通过杂志(《人民中国》、《北京周报》、《中国画报》)及日语国际广播电台(北京广播)等从事对日宣传,以此在日本民间提高亲华舆论,发展民间关系。不过该书对日本组在对日宣传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涉及较少。

如前所述,文革后,日本组因廖承志被打倒而被迫停止工作。1966年3月,因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决裂,导致贸易促进会和友好协会分裂。1971年2月备忘录贸易谈判开始后,日本组工作得以恢复。1972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也是重组后的日本组担当各项具体工作。但是,日本方面的备忘录贸易相关人士却没能出现在外交谈判的舞台上。那是因为日本外务省担心在日中首脑谈判中出现二元外交,不希望备忘录贸易相关人士留在日中官方外交的层面(第6章)。

而在台湾看来,日本组的对日工作是针对其开展的反共外交的对抗措施,目的是为了从台湾手中夺走日本政府。于是,台湾在与日本政府谈判的时候极力游说在半官半民方式的LT贸易中削减“官”的部分。特别是1963年6月,针对对华出口尼龙生产成套设备使用日本进出口银行贷款问题,蒋介石亲自表示了强烈抗议(第7章)。

台湾方面的对日工作,是在日美与台湾联手共同抵制共产主义势力发展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台湾坚持其获得的国际空间,为进一步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积极开展反共外交。对于日本,蒋介石依据日本战败时曾提倡的“以德报怨”,并由此在日本各界产生的对台恩义论,强调两国的特殊关系,每逢有事,便要求日本政府确认1952年签署的《日华条约》,确保日本与台湾之间正式的国家关系,1951年和1964年的两封吉田书简是《日华条约》的补充。蒋介石与张群领导的国民党中央,为拉拢自民党主流右派势力成为亲台派,积极开展对日本政界的工作,其目的在于预防和抵制中国的对日工作。

第7章中描述的台湾对日工作的方式和内容,刚好与日本组相反。台湾拉拢自民党亲台派,中国大陆却是把自民党亲中派与在野党作为工作对象;台湾以拉拢政界人士为重点,大陆则是以积累方式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文化、经济、贸易领域中。另外,台湾重视与日本政府的正式外交关系,而日本组更加重视民间舆论的导向。这种倾向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后、即日台断交后彻底转向,也就是说中国大陆转为致力推进与日本政府的官方外交,而台湾则以亚东关系协会驻日事务所为据点,围绕日中航空协定等问题有组织性地加强对日本政府的批判,强化对日本公共舆论的反共宣传。这种转变使台湾在日本民间的影响力得以提高,而亚东关系协会驻日事务所发挥的作用也恰似日本组。^①

此处粗略介绍一下对日工作中大陆和台湾攻守的国际背景。面对中苏关系恶化,同时又不得不与最大敌国美国对抗的中国大陆来讲,处于最强中间地带的日本成为从台湾手中夺回国际发展空间,摆脱国际孤立局面的最重要一环。从历史渊源来看,围绕日中战争的战后处理问题,有蒋介石倡导的“以德报怨”的恩义论和毛泽东提倡的以阶级论为准则的“二分法”(要分清作为敌人的侵华战争领导者和作为友人的广大日本人民群众)两种。在这两者之间围绕与日本国民之间纽带的正统化存在理论之争。

业务能力极强的知日派队伍日本组,受毛、周的指令,在坚持原则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的同时,准确无误地处理日本工作,导演出了这一特殊的两国关系。中国大陆把美苏两大国看作正面敌人,为了争取对其统治中国的正当性的认同,同时提高国际认知度,与台湾明争暗斗的激烈程度,可以说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该书让我们注意到日本组所肩负的正是为中国开拓国内外生存空间,加强对日工作的重要使命。

^① 笔者在拙著《现代日本人の中国像——日中国交正常化から天皇訪中まで》(近期出版)中,就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对日外交、对日舆论工作的攻防,单设一章(第5章「戦後日本人の台湾像」)进行了论述。

四、从当代政治角度看日本组的遗产

第三部由以下两篇论文构成：

第三部 从当代中国的角度看廖承志和那个时代

第 8 章 周恩来与廖承志——从中国革命到中日友好(胡鸣)

第 9 章 如何理解“廖承志时代”——战后中日关系的情报政治学(刘建平)

这两篇由中国新锐学者撰写的论文,主要论述了作为个人的廖承志和作为组织的日本组的功过,但两者的评价却形成鲜明的对照。

胡鸣认为,周恩来和廖承志终其一生构筑的信赖关系,使他们培养出来的知日派对日工作,在日本各阶层广泛建立起亲中派人际关系。而这种关系也成为日中友好关系的基石,对日本组的功绩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相反,刘建平则认为日本组开展对日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广泛支持及援助,所以利益主要偏向于日方。日本组的对日工作抑制了中国人民对战争的仇恨,对日本战犯的处理过于宽大,而在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又放弃了战争赔偿等,是一种暧昧而妥协的解决方式。据此,刘建平最后把中国对日外交失败和挫折的主要原因部分归诸于日本组的工作,并予以批判。

关于日本组的功过,传统的正面评价(胡论文)和修正型否定(刘论文)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如何理解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意义。即是把日中邦交正常化看作是战后两国和解的结果,还是战后对日工作方式造成的日中友好关系的挫折。对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说得极端一点,就是通过把台湾问题列为主要论题,而放弃战争赔偿,模糊战争责任问题,搁置领土争议。这种“正常化”的方式,是应该看作是对“二分法”的贯彻,还是应该看作是已超出了中方忍耐界限失败的结果。进而言之,今天在综合回顾邦交正常化的得失时,是应该把它看作是对双方互利的,还是只对日本一方有利。

选择站在哪种立场,直接关系到如何重建眼下被称作是战后最坏的日中关系的态度决定,是十分紧迫的课题。也就是说,是把重建的原点回归到实现邦交正常化的 1972 年体制,还是超越 1972 年体制,甚至摆脱 1972 年体制,重新找出一种新的日中纽带理论。

当然对这一课题的探讨并非该书的任务,不过借鉴该书对日本组作用和职能的阐述时,有哪些值得反思,在本书最后一章《尾声 知日派的作用——对 21 世纪日中关系的启示(編集委员会)》也有所提示。

在日中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日本组的主要工作对象自民党亲中派在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决策中,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随着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廖班也随之消失,大部分知日派工作人员不再从事日本业务,几乎都没有进入外交部工作(第 1 章第 41 页)。1983 年廖承志去世,“对日工作的廖承志时代”也宣告结束。此后,正如井上论文中写到的“伴随邦交正常化而形成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后,日本组所建立的人脉关系作为后备渠道继续发挥作用,保证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前日中关系的稳定发展”(第 6 章第 227 页),我们可以对日本组培育出的知日派人才为建立良好的日中关系所起的作用给予积极的评价。

尽管如此,通过刘建平论文及其一系列相关研究表明^①,有这样一种印象难以抹去:冷战时期美苏成为中国的敌人,在与台湾争夺正统性的激烈竞争中,中国大陆为了确保并扩大其国际生存空

^① 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刘建平:《当代中国史论:实证的知识呈现与思想表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间,对日本进行了过多的让步。发挥先锋作用的是日本组,而指挥他们的则是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日中两国特殊关系的周恩来。

邦交正常化以后,虽然日中两国间遇到了历史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光华寮问题等各种历史问题的曲折,但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等各时期的中国领导人都基本上保持了对日友好路线。其间,以1992年的日本天皇访华为契机,日中两国开始摸索面向未来的合作伙伴关系,在1998年江泽民访日之际,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形成了新的日中关系框架。

但是后来由于2001年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中关系再次因历史问题停滞不前。2010年以后,围绕领土问题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冷冻,至今仍然未有缓解的迹象。面对失去修复能力的日中关系,日本舆论界在寻找原因时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在作为一个大国崛起之前,经历了150年受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屈辱历史,所以优先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而欠缺对邻国和周边国家的考虑。这种主张有历史性根据,而且不从如此长期性的历史空间来把握,就难以说明现在中国的变化。

通过该书的分析,让我们认识到必须要立足于日中两国间的特殊关系这一历史性的观点来重新考虑此问题。并且,我们还必须回顾日中邦交正常化前的外交方式和在那段时期日本组的对日工作作风。而在当代中国,可以说通过对日让步来确保相互间的利益这种对日外交的传统方式已告终结。同时中方也在痛感因过去的对日让步而失去的东西不能恢复。正因如此才注意到让步的对象日本在历史问题、战争责任问题等方面对曾经得到中方的各种让步反应过于迟钝。为此,中方的气愤和憎恶的情感也随之进一步持续,甚或加强。

日本组的时代已经终结。但我们不能忘却日中两国有着特殊关系这一历史。该书大量使用近年公开的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三方的外交史料,重新把读者带入廖班的知日派对日外交的工作现场,具有极强的现场感,让我们重新看到了日中两国间特殊关系的一幕。

[作者马场公彦,日本岩波书店编辑部部长;译者胡颖,日本神奈川大学外国语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莹莹)